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通史

第四卷

军事文献出版社



（三）参加地方工作，剿灭土匪

西南解放后，西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除以一部准备进军西藏外，将部队实行彻底分散，分区包干，担负参加城市接管、开辟农村工作和剿灭土匪等任务。

在城市接管工作中，除重庆市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直接领导进行接管外，对贵阳、成都、昆明、雅安、泸州、南充等主要城市及腹心地区和交通线上各城市，都由包干各该省（区）与专区的兵团、军或师，抽出干部和部队，在省委、区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接管；其他小城市，则由包干该地区的师、团或营进行接管。各部队在参加上述各城市的接管工作中，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有关城市接管的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西南局对接管工作的各项具体指示，充分运用了人民解放军过去参加城市接管中所取得的经验。至1950年2月，西南各主要城市的接收工作即已顺利结束（云南因进入稍晚，迟至4月结束）。

在集中力量进行城市接管的同时，即开始分遣部队至指定地区，布置剿匪反霸、征收公粮和组织春耕生产等工作。但在部队刚刚开始展开、群众尚未发动的时候，美蒋匪特结合西南反动封建势力，纠集大量的旧军官、散兵游勇、惯匪流氓，迅即乘隙到处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全面发动了土匪游击战争。土匪的政治性质非常明显，他们在“反共救国军”之类的反动旗号下，提出“抗粮”、“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等政治欺骗口号，利用反动封建迷信组织和以残酷屠杀的方法，欺骗和裹胁部分群众，煽动部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和旧乡保武装进行叛乱，挑拨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与人民解放军为敌，疯狂地抢劫公粮等物资，破坏工厂矿山，残害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骚扰城镇和交通要点，严重地扰乱社会秩序，阻断城乡交流，使征粮、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都受到严重影响，并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

1950年2月9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指示西南全党全军必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必须正确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会议提出以“剿匪生产”作为农村工作当前的中心口号，并指出：迅速



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各阶层人士所热烈拥护的；反霸是农村反封建斗争的必经过程，但当前在策略上则暂时不公开提出“反霸”口号，同时对群众性的封建迷信组织也暂时置之不理，以利于孤立和打击匪特和少数恶霸首恶分子，分化地主阶级，团结和中立一切可以团结和中立的人士，减少工作中的阻力，以利于发动群众。在剿匪步骤上，会议决定首先歼灭腹心富庶地区之匪，尔后扩展至边沿贫瘠山区，特别要迅速净化四川腹地，以保证征粮和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

西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精神，多次颁发剿匪指示，指出剿匪斗争是西南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必须立即纠正某些部队不愿意分散的思想倾向，必须加强农村工作特别是剿匪的方针政策的教育，必须牢固地树立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是一支工作队和当前主要是工作队的思想。同时，对剿匪工作进行了具体布置，一面加强腹心城镇的守备，组织有关部队采用分段包干的办法对川江、嘉陵江、涪江、岷江、成渝、川康、渝筑、昆筑等各主要交通干线进行守备、护航及其两侧的剿匪工作；一面集中必要的兵力，对各省腹心地区特别是四川腹心地区的大股土匪，组织重点围剿；对各省边沿地区特别是贵州及川东、川南边沿区的30余座县城和若干边远地区，则暂时撤出或置之不顾，留待以后逐步解决。

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的指示，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建立了县区人民政权，加强了腹心城镇的守备，掩护了交通的安全和展开了征粮工作。与此同时，组织了若干机动兵力，于3月至7月间，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点围剿。其中主要的有：第十五军军部及所属第四十五师，开赴川南之泸州至宜宾线，直归西南军区指挥，担任剿匪及掩护交通运输任务。在开赴川南途中一路与匪战斗，掩护了当地军分区和政府。因该区匪情严重，西南军区又令该师率2个团归贵州军区指挥，剿灭该区土匪。川东军区对涪陵、南川、巴县地区的围剿，首创歼匪1万余人的成功范例；接着在武隆、彭水以南地区，桐梓山区和彭水、黔江、酉阳地区，组织了围剿。川西军区镇压了成都东南之龙潭寺、石板滩地区匪特的两次暴乱；并在邛崃、大邑、总岗山地区，灌县东北，安县、彰明、江油之间，新津、双流、仁寿之



间以及双流以西地区，组织了若干次围剿和进剿。川南军区在长江以北地区，雷波、马边、屏山地区及横山、安边地区，组织了围剿。川北军区在渠江、涪江、嘉陵江三角地带组织了围剿，并镇压了南充、射洪、中江地区的匪特暴乱。西康军区在西昌地区、总岗山区及大渡河两岸组织了围剿和进剿。贵州军区在雍安（今瓮安）、余庆、湄潭地区、金沙地区及石阡西南地区，组织了围剿。云南军区在玉溪、新平、易门、通海地区和牟定、盐新、广通地区组织了若干次围剿和进剿。第十五军担任剿灭川滇黔康4省边境之匪，保障川黔滇公路及川江航道安全。上述地区东至川黔公路，西至大凉山，南至云贵边之会泽、永城，北至川江南岸，纵横各约500余公里，跨4个省、7个军分区、30余县，其中16个县向为惯匪巢穴，为我之重点进剿区。经3个月清剿，歼匪7万余人。

在这些围剿斗争中，各部队在依靠群众的基础上，展开了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强大攻势，充分地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术。对集中的大股土匪，以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组成了纵深合围圈，严密控制渡口及大小道路，断匪逃路，尔后以数十路的梳篦队形，向心合击，纵横扫荡，使匪特无任何空隙可乘；对较小股匪，则出敌不意，采取远途奔袭的战术，直取匪特巢穴，以兜击、钳击动作，力争全歼；对流窜的股匪，则不分地区，不计远近，跟踪穷追，不死不止。当股匪在强大的军事打击下，转入分散隐蔽，企图继续保存和繁殖其力量，准备作长期斗争的时候，各部队迅即以分散对分散，以连排班为单位，转入驻剿，坚决肃清小股散匪。剿匪中全体指战员高度发扬了主观能动性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翻越崇山峻岭，攀登悬崖峭壁，寻遍深林绝谷，战胜炎暑霖雨，克服了重重自然障碍，忍受了交通不便、物资供应不上的严重困难。不少部队在几个月没有油盐 and 医药奇缺的条件下，取得了全歼股匪的重大胜利。

剿匪中，特别是转入驻剿时，各部队迅即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征粮和组织春耕生产。提出了“人人是战斗员，人人是宣传员，人人是工作员”的口号，一面模范地执行政策纪律，以实际行动揭露匪特的欺骗宣传；一面大力开展政治瓦解工作，采取各种形式，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明士绅座谈会、匪属座谈会、群众大会等，大力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人民解放军的剿匪决心，



特别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剿匪政策等等，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西南广大农村特别是匪特控制地区，由于封建势力的长期统治和匪特的造谣屠杀，群众一开始往往顾虑较多，不敢和解放军公开接近甚至盲目逃散。但当剿匪斗争全面展开，剿匪政策已为群众所了解的时候，群众就积极为解放军带路，报告匪情，争取瓦解匪众。土匪大多数是被特务匪首裹胁和欺骗的农民，他们一经了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以后，便纷纷悔悟，携械投诚或自动回家生产，土匪内部就日益动摇分化。在开展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的同时，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 1950 年 3 月 15 日《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建立了专署、县、区剿匪委员会或剿匪生产委员会，组织了广泛的剿匪统一战线，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原则上由党委书记、军事首长担任，并吸收了一些开明士绅和进步知识分子为委员。乡保两级组成剿匪小组，作为剿匪初期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公开组织形式。通过剿匪委员会和剿匪小组，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深入开展对土匪的争取和瓦解工作。这样，就团结了各阶层的人士，组织了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力量，从而有效地分化了地主阶级，孤立和打击了匪特和恶霸首恶分子。

随着剿匪的胜利发展，各部队进一步进行彻底分散，以班、排甚至小组为单位，深入到各村户，进行宣传、访贫问苦和调查研究。通过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办训练班、诉苦等各种方式，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并选择其中一些成分好、觉悟较高的人组成秘密的农民协会小组，团结和教育群众。在剿匪斗争中，结合群众当前最迫切的要求，如征粮中的合理负担，反对瞒黑地，清积谷，反夺佃以及兴修水利等等，进一步发动了群众。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则适时地成立农民协会或农协筹备委员会，并暂时起农村基层政权的作用。随后即宣布取消保甲，将旧保甲人员集中训练进行改造，分别处理；对旧乡保武装则全部缴械，易地集训，进行彻底改编。广大群众一经发动和组织起来，其阶级觉悟特别是剿匪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积极主动地站岗放哨，检举或逮捕匪首，瓦解匪众，形成了一个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全面的剿匪反霸斗争的高潮。

正确地执行党的农村工作各项政策特别是剿匪政策，是胜利地进行剿匪、发动群众和迅速开辟农村工作的关键。在剿匪反霸和征粮等



工作中，各部队反复进行了党和政府的法令政策的教育，纠正了剿匪初期一个极短时期内在政策上失之过宽，和个别部队杀人过多的右的和“左”的偏向，严格地执行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对于怙恶不悛、民愤极大的首恶分子，由县（或团）所组织的人民法庭，经过群众公审，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对于投降自新分子，均严格履行登记手续，取保释放，交给群众管制，对其中假投降假自新的匪特，一经查明，从严惩处；对戴罪立功者，则从宽处理或根据情况分别予以表扬或奖励；对一般胁从分子，经过短期教育后，释放回家生产。在征粮工作中，坚决贯彻了合理负担的政策和中共中央规定的各阶层的负担比例以及负担面必须达到70—80%的决定。这样，就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意志，团结了最大多数，分化了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了匪特和恶霸首恶分子，使剿匪斗争日益深入，农村各项工作迅速展开。

至1950年7月，全区共歼匪37万人，各省腹心地区基本净化，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征粮工作也已告一段落，群众初步发动起来，城乡交流日趋活跃，有力地打击了美蒋匪特和西南反动封建势力，整个西南工作开始转为主动。但是，就西南广大农村来看，封建势力仍然处于优势，若干边沿区特别是贵州边沿区尚有21座县城为匪盘踞，妄图作垂死挣扎；云南边沿地区的土匪正积极进行破坏活动；广大腹心地区的潜散匪特，仍然以公开和隐蔽、合法和非法、有根据地和流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和复杂。

7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会议，会上根据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用3年左右时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任务和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改及肃清匪特恶霸的指示，并结合西南的具体情况，决定于1950年冬及1951年春在全区开展清剿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并要求全区在7、8、9三个月内，完成干部整风、轮训干部和整理、建立各级农民协会等一切准备工作。会议强调指出：清剿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反封建斗争中的“淮海战役”，千万不要低估封建势力的反抗，他们将采取各种形式包括武装斗争的形式来同我们作斗争，因此，减租退押必须和清匪反霸紧密结合，只有清匪反霸的胜利，减租退押才能顺利进行，也只有减租退押



的彻底完成，才能改变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巩固农村的阵地。会后，西南军区党委全体会议作出了《关于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工作的决定》，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也是军队的中心任务，军队必须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并决定：在继续深入腹地清剿的同时，必须抽调足够的机动兵力，大力组织对边沿匪特控制区，特别是贵州边沿区的围剿和会剿。力争在1950年之内肃清全区股匪，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上述指示，在地方同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进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团以上干部中的整风运动，克服了某些干部作风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骄横蜕化的思想，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普遍开办了干部训练班，进行了清剿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政策和策略的教育，并在广大群众和各阶层人士中广泛宣传了减租退押和土改的政策法令。普遍地举办了农民训练班，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或农民大会，深入地普遍地放手地开展了诉苦运动，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农协组织，纯洁了农协的领导骨干；树立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领导；同时，普遍建立了农村基层政权，逐步把地主掌握的枪支转入农民手中，建立了“剿匪自卫队”，负责维持农村治安，管制投降自新匪特，深入地开展了捕捉匪首、肃清小股土匪的斗争。

8月10日，西南军区命令第十五军及宜宾、乐山、昭通、曲靖、武定、毕节、西昌诸军分区部队各一部，统由秦基伟军长指挥，对川滇黔康4省边境土匪实施围剿。经3个月战斗，共歼匪3.7万余人，并在上述地区协助组织了2000多个农民协会和300多个联防队。与此同时，全区共抽出约7个师的机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在中南军区部队的密切协同下，组织了黔东南、黔东南及黔桂边的围剿和会剿。在川陕边、川康边、黔西北、黔南、滇南及滇西边沿地区也先后组织了若干次围剿。这些边沿地区，都是地区辽阔、交通不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同时由腹心区窜入了许多匪首恶霸，因而斗争极为艰苦复杂。各部队顽强地战胜了深山老林、风雨连绵、瘴疠盛行等远较腹地剿匪更为严重的自然条件的困难，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机智灵活的战术，密切协同，日以继夜，连续作战，打开了许多云崖隧洞，摧毁了



匪特巢穴，歼灭了土匪有生力量。同时，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团结了少数民族广大群众，争取了少数民族的中上层人物，粉碎了匪特挑拨离间的阴谋，加强了民族团结，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至10月底，全区共歼灭土匪68万人，除某些边沿地区外，股匪基本肃清，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完成。

1950年11月初，西南全区党、政、军、民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统一领导下，全面掀起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坚决贯彻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和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路线，坚决打击了破坏减租退押的恶霸地主。为了保证减租退押运动的顺利进行，各地以群众武装为主，以地方武装为骨干，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了全区的群众性的清匪反霸斗争。普遍建立了情报站、检查站，组织了远征捕捉队，积极侦捕潜伏和远遁城镇的漏网匪首，组成了“天罗地网”，彻底肃清了散匪。同时清理了一切积案，对于勾结土匪抗拒减租退押和进行武装破坏的地主恶霸，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对于一切为匪特恶霸操纵的封建会道门，则在群众中揭露其反动面目，坚决予以取缔。中共中央对西南军区的剿匪工作经验极为重视，毛泽东主席于1950年11月16日批转了西南军区第四号剿匪简报，并写了按语。指出：“西南军区对于剿匪工作极为认真，剿匪中执行的各项政策亦是正确的，故取得了很大成绩。”至1951年5月，全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基本结束。西南广大农村，通过这一运动，不但从政治上严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而且大大削弱了封建经济基础，更多地满足了农民的经济要求，使农民完全处于优势。全区农民从减租、退押和赔罚所得共约37.5亿公斤米，相当于西南1950年全区公粮的1.5倍。广大农民经过实际斗争特别是得到实际翻身利益后，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生产积极性都迅速提高，积极将所得资金投入生产；同时，各级农协组织更有了极大的发展和巩固，全区农协会员共达2260万人，并建立了一支250万人的人民武装自卫队。

西南军区部队，在将近1年半的艰苦斗争中，胜利地完成了参加地方工作、剿灭土匪等光荣任务，歼灭土匪100万余人。除川西北、大小凉山和侏仡山区等少数边沿地区外，全区土匪基本肃清。占西南总人口90%以上的6000余万基本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并在12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从而粉碎了美蒋企图建立“大陆游击根据



地”的阴谋，严重地打击了西南强大的封建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加速实行土改和进行城市中的民主改革准备了良好条件。

西南军区部队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胜利之所以取得，主要是由于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的七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各项具体指示，坚决地及时地把60万军队彻底分散，以分区包干的办法，执行了战斗队和工作队并主要是工作队的任务。这一胜利也是由于各兄弟解放区密切协同，广大人民热烈参加和积极支援，以及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结果。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西南军区不仅逐步地抽出了大量主力部队和大量的干部，征调了大量的新兵，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和新中国空军、海军及炮兵、装甲兵等军兵种建设，而且根据可能的条件，部队又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加强现代化革命化的建设，继续负担起保卫和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国防的光荣任务。

十一、进军西藏

(1950年1月—1951年12月)

(一) 中共中央解放西藏的方针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是青藏高原的主体，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尼边界，为世界最高峰。冈底斯山横贯西南部，和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一起通称藏北高原。东部属横断山脉和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形成的纵谷地带。交通极为不便。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里聚居着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一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后，西藏也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他们采取挑拨欺骗等手段，妄图使西藏独立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同清朝政府一样，实行民族压迫和离间的政策。致使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民族内部产生了隔阂和不团结。而西藏一些上层统治人物，为了保持对藏族人民的统治，则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镇压广大人民及其统



治集团中爱国人士的爱国行动，致使西藏人民长期在封建农奴制度下陷于被奴役和痛苦的深渊。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国内共同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建设事业。为了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与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指示：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于4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南军区命令第十八军、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执行进军西藏的任务。1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南局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组成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

5月17日，中共中央就进军西藏的方针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中指出：“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只要西藏方面“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在策略上应该继续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

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十项政策，于1950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作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和战斗进军的政策依据。其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实行区域自治，对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地位职权不变；对西藏的社会改革事宜，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人民提出要求时，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对过去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脱离联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任职，不咎既往；对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给以充分的保障等。为了争取西藏问题和平解决，西南军政委员会特派西藏爱国人士、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前往拉萨。行至昌都时，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不仅拒绝谈判，反而杀害我方派出的联络人员，并将兵力布防于昌都及其周围地区，企图阻止我军进藏。

（二）进藏的准备

1950年2月初，当我军开始进行进藏准备时，川西及西康等地土匪活动猖獗，严重地影响了准备工作的进行。因此，西南军区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将进藏时间由原定的1950年4月推迟至当年冬季。将第十八军主力展开在成都到雅安公路沿线，一面配合川西及西康军区部队剿匪，一面进行进藏的准备。

进藏的准备工作是极其艰巨和复杂的。西南军区动员了全区一切可能的力量从各方面予以支援，并要求进藏部队尽速、全面做好准备工作。在思想上，由于西藏高原的自然环境特殊，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民族间隔阂，以及政治情况复杂等等，给部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因此要求部队的思想和政策水平必须大大地提高。在物资供应上，由于西藏地广人稀、经济极为落后，部队所需物资不可能就地取得，只能依靠内地；而西藏与内地的交通又极为困难，仅有的几条小路，也因气候的影响，一年中只有7月、8月、9月三个月（旧历）较好走，因此，要解决大量的物资供应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其他方面，如部队的装备、军事训练、行政管理等问题，也都需要加以解决。这样，就使部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保证这一转变的实现，使部队的思想、物资供应等适合新情况的需要，胜利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确定西南军区担任进藏任务的同时即指示：进藏部队，必须在民族政策、语言等方面，加以特殊的训练，配备精良的武器，必须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西南军区遵照毛泽东主席指示，并根据西藏及进藏部队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如下的主要准备工作。



(1) 为提高进藏部队对于解放西藏重要意义的认识，牢固地树立长期建设西藏、巩固国防的思想，195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及西南军区颁发了《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无限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和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恪守民族政策，亲密团结藏族人民，坚决、勇敢地完成解放西藏，建设边疆，保卫国防的光荣任务。进藏部队根据政治动员令和部队少数人员中开始滋长的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思想，以及由于对西藏情况缺乏具体全面的了解而产生的畏惧、疑虑，甚至抵触情绪，反复地进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教育、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并全面地介绍了西藏的情况，阐明了解放西藏的伟大意义。同时，又组织了群众性的辩论，整顿了党支部，评选了渡江以来的功臣模范，并召开了庆功出师大会。经过上述一系列工作后，部队的觉悟大大提高，进军西藏的积极性大大发挥，一致表示要战胜一切困难，坚决完成进军任务，并争取在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功。

为具体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提高部队对于遵守民族政策，团结藏族人民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进藏部队专门设立了政策研究室，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具体地规定了各项执行办法，并在全体人员中进行了民族政策的教育，掀起了学藏文、藏语的群众性活动。经过这一教育，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政策观念，为执行民族政策在思想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为调查研究西藏情况，中共中央西南局及西南军区邀请了熟悉西藏情况的人士进行了多次的座谈。3月间，又指示第十八军组织先遣支队分赴甘孜、巴塘地区，进行西藏的政治、经济、兵要地志等各方面情况的调查及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等工作。先遣支队在巴塘地下党和藏族人民的大力帮助下，克服了重重困难，进行了许多艰苦的工作，不仅完成了军区所赋予的任务，而且大力进行了争取团结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开办了训练班，训练了100余名藏族青年，购买了一批粮草，为后续部队的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共中央西南局还组织了政、贸易、文化等各方面的干部准备到西藏去工作。

1951年3月，为保证部队的物资供应，在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中，中共中央西南局及西南军区确定了“只要使用合理，并可能做到需要什么给什么”的支援方针。作出了“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



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的决定。为加强后方支援工作的领导，设立了支援司令部，昌炳桂为司令员、胥光义为政治委员、何雨农为参谋长，调集了7个工兵团，11个辎重团和1个空运师，担任筑路和运输任务。在康藏高原上修建公路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为世界公路建筑史上所罕见。但是工兵部队和参加筑路的进藏部队，在毛泽东主席的“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修路”的指示下，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发出了“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豪言壮语。他们在藏族人民的帮助下战胜了重重的自然障碍，历尽了艰险，排除了万难，仅以4个月的时间（4月至8月）即修通了长达600余公里的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并随即进行了加固和由甘孜向西的延修工作。这样，使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得到了有力的保障。随着公路的修建，中央军委拨给了数百辆汽车。辎重部队，特别是汽车部队，也展开了紧张的运输。和筑路部队一样，他们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将万余吨物资运给部队，保障了部队及时地得到补给。空运部队，在设备陈旧、气候恶劣的条件下，以英勇顽强的精神，突破了“空中禁区”，进行了百余次空投，将300余吨物资运给部队，弥补了汽车运输的不足，保证了部队一些急需物资的供应。供给进藏部队的大量物资中，有许多是为适应高原地带部队生活的特殊需要，由中共中央分配各地区、各大城市限期赶制和筹集的。如饭粉、蛋黄蜡、携带燃料、皮衣，以及大批的银元、黄金等等。这些措施不仅保证了部队的物资供应，而且大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情绪，增强了部队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4）为使进藏部队的进军、作战适应高原地带的情况，加强部队的火力和机动能力，对部队的武器进行了改装，把原有的重机枪一律换成不需驮载的重机枪，山炮大部分换为无后坐力炮，班、排长及机关工作人员一律配备了轻便的自动武器。这些所需的武器，一部分由重庆各兵工厂赶制，大部分由西南军区其他部队选调。各部队都以极大的热情，把最好的武器送给进藏部队，有些部队还自动形成了报名参加进藏的群众活动。重庆兵工厂的工人也自动放弃春节休假，突击生产。各部队及工厂的热情支援，给进藏部队以极大的鼓舞。部队改装后，又利用修路和剿匪的空隙，广泛地开展了适应高原地带的军事训练，如雪地战斗、森林战斗、帐幕宿营法、骡马爱护法、取火法、物资保护法、疾病防治法等。在开展军事训练中，由于贯彻了军事民



主，让群众根据现有条件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激发了群众的创造性，提高了克服困难的信心，掀起了学习的高潮，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西南军区进藏部队在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7个月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进军的准备，奠定了胜利进军的基础。

（三）昌都战役

在进军西藏的准备期间，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下，不仅拒绝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和平谈判，反而继续进行背叛祖国的所谓“西藏独立”的活动，更加积极地扩军备战。将总兵力的2/3，计7个代本的全部和3个代本的一部共4500人，士兵3500人，部署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西岸的广阔地区，统归昌都边使总署总督指挥。妄图利用金沙江，扼守入藏的咽喉要道，以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为了扫除进军西藏的障碍，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一方面继续积极地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政治争取，一方面决定进藏部队利用秋后有利季节（公路运输已有保障，雨季已过宜于行军，粮草可以就地部分解决等），在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的配合下，于10月间进行昌都战役，首先排除进藏障碍，歼灭藏军主力，而后向西藏进军。

根据藏军部署的特点及其常采用的战术，西南军区领导估计战役开始后，藏军的行动可能有三种变化：①收缩兵力，扼守若干要点与我作战；②就地分遣，打游击；③发现我力量强大不可抗御时，除一部扼守要点，结合士兵游击袭扰，阻我前进外，主力则分路迅速后退，以保存实力。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其退路可能有二：一是经恩达、类乌齐西退拉萨；二是经邦达、八宿再西向拉萨或沿河谷南下退往察隅地区，而以第一种退路可能性为大。在战术上，藏军可能大举破路，阻我前进，以主力实行侧击或抄袭我之后路及补给线，并可能以骑兵部队进行远距离的偷袭。其士兵都自备有武器，地形熟悉，射击准确，击散后可能散伏于树林山岭，以冷枪滚木礮石阻击我军。

基于上述分析判断，西南军区领导指示第十八军在战役指导上，正面兵力不宜过多，而重在使主力部队进行翼侧的迂回，务求先切断敌之退路，分割包围而歼灭之。



第十八军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决心分成南北2个作战集团，而将主力使用于北线。北集团分为三路，统由第五十二师指挥。右路以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团及2个连组成，由邓柯偷渡金沙江，会同由玉树南下的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直插类乌齐、恩达，断敌向西和西北的退路，并准备阻止了青之敌东援，另以骑兵支队一部直插昌都以南，阻敌南窜；中路以第五十二师师直、第一五六团、第一五五团、军炮兵营组成，由邓柯隐蔽渡金沙江，经生达等地，直捣昌都；左路以军直侦察营、工兵营及第五十四师的炮兵连组成，由德格西渡金沙江，歼灭同普、江达之敌，配合中路主力，从正面攻击昌都，并以一部迂回昌都以南，歼灭可能南退之敌。南集团分为两路，统由第五十三师指挥。以第五十三师第一五七团、炮兵连、工兵连，由巴塘渡江，围歼宁静地区之敌，主力出邦达、八宿，断敌南退道路；以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及第一二五团1个营，由贡山、德钦出动，歼灭盐井、门工、杜梁之敌，尔后向西北佯动。

昌都战役于1950年10月6日开始。北集团担任右路迂回的第一五四团于6日首先出击，由邓柯渡江，经巴塘（玉树西南）尾随西北军区骑兵支队之后，出敌意外地迅速隐蔽南下，绕过敌人，直插类乌齐，按预定计划进占恩达。该路部队发动班、排、连、营开展战斗比赛，不顾疲劳和行军掉队及病号日增等困难，每人平均负重40公斤左右，越过崎岖辽阔的丘陵和草原地带，在天气严寒、空气稀薄、雪地露营等难以想象的自然条件下，以日行60公里的强行军，兼程猛进。至18日，第一五四团掉队1/3，骑兵支队跑垮战马500余匹，只剩骑兵100余人和弃马步行的100余人，终于先敌数小时抢占恩达，并向东进逼，缩小包围圈。19日，骑兵支队主力及第一五四团一部未作停留，立即向昌都以南机动，完全切断了昌都之敌向拉萨的退路。

担任向昌都作正面攻击的北集团左路部队，于10月7日渡江，向岗拖之敌攻击。因迂回部队未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正面突击部队火力与运动也未组织好，未能将敌歼灭。该敌会同江达之敌向昌都退却。我军当即尾追，至16日，在觉雍以西15公里处歼其100余人。接着，向昌都攻击前进，19日黄昏，逼近昌都。

北集团中路第五十二师师直、第一五五团、第一五六团，于7至9日分批渡江。在国德、生达地区，小乌拉山地区，因迂回部队走错路，



加之敌军沿沟布防，阻我前进，攻击部队又不善于大胆穿插分割，猛冲猛追，未能抓住敌人。敌经生达向昌都撤退。我军当即尾敌猛追，并以第一五六团的轻装先遣营从左翼取捷径兼程前进，于19日黄昏进抵昌都近郊。

南集团之第五十三师所部，于7、8两日分批渡江，以两翼迂回，钳击宁静之敌，至12日，迫敌第九代本400余人起义，将敌南线主力解决。我军主力即于15日北向邦达、八宿方向继续疾进，堵击可能由昌都南退之敌。

南集团的云南军区部队于10月5日对门工之敌发起攻击，因其正面部队动作过早，未等迂回部队赶到预定地点即发起战斗，仅俘敌数人，余敌逃去。我军当即从左右两翼实施平行追击，11日，将门工北逃之敌士兵400余人追歼于杜梁地区。12日，分两路钳击盐井之敌，又歼敌100余人，尔后部队即于盐井、德钦一带待机。

在我各路部队不顾疲劳，勇猛追击，迅速逼近昌都的形势下，西藏昌都总署首领见战局已无法挽回，即率第二、第四、第三、第七等4个代本放弃昌都，向恩达、类乌齐方向退却，在发现其退路已被我军切断，又折转向南方的邦达、八宿。19日20时，第一五六团先遣营解放昌都，经觉雍西进的军直2个营也于当夜赶至，并立即由左翼对南逃之敌实施平行追击。与此同时，由昌都右侧后作战役迂回的骑兵支队，已先敌抢占昌都西南的宗驿山，控制了山垭口及道路。20日晨，藏军退至宗驿山遭我阻击，在走投无路和我政治争取的情况下，全部2700余人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此后，我北集团主力即转入分区清剿，肃清零星残敌。至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共歼藏军5700余人，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步枪3000余支。

歼灭藏军主力的有生力量，是战役指导的中心问题。此役，战役部署的重点放在两翼迂回、特别是北集团右路的迂回上，以求首先断敌退路，尔后加以聚歼。同时要求正面各攻击部队也能迂回包围、穿插分割敌人，一股一股地捕捉歼灭。强调在查明敌人退却时，应不顾疲劳，迅速勇猛追歼。在实施过程中，迂回部队从外翼千里迂回，绕过敌人，先敌抢占向西南的退路，随后又不顾疲劳继续南下，适时抢占敌人向南的退路。这种坚毅灵活的动作，对完成战役任务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追击部队的迅速勇猛追歼，又保证了战役的胜利。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我军进藏的门户，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反动统治分子企图以军事力量阻止我军解放西藏的迷梦，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统治集团的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和继续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昌都战役后，进藏部队一面利用战役后的有利形势，通过各种关系，继续积极地进行政治争取工作，一面巩固和建设昌都地区，成立了中共昌都地区工委和解放委员会。召开了各县（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了统战工作和宣传工作。部队除抽调干部进行地方工作，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思想，进行高原地带的行军、作战等教育训练外，又立即抽调兵力开始修建甘孜至昌都段公路和甘孜飞机场。藏族群众在昌都解放委员会的领导和各地支前委员会的协助下，出动 2.5 万头牦牛，将近 5000 吨的物资由甘孜以西之玉隆运至昌都等地，为下一步进军拉萨解放全西藏作了充分的准备。

（四）和平协议达成后，在西北军区协同下的战备进军。西藏的解放

昌都战役的胜利，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为广大僧俗人民所了解，大大地鼓舞了西藏人民的爱国情绪，有力地促进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内部分化。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爱国派更加坚定，顽固派开始动摇。1951 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4 月 29 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5 月 23 日，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和平协议的签订，是帝国主义企图阻扰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阴谋的又一次严重失败。但他们并不甘心，对协议进行了种种的污蔑和诽谤。西藏统治集团中最反动的分子，仍企图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阻止和破坏协议的执行。根据这一情况，中央军委按照协议规定，于 1951 年 5 月 25 日，令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以战备的姿态，分路进驻西藏，以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进军的具体部署是：

（1）第十八军除留第五十三、第五十四师及第五十二师的第一五六团继续修建康藏公路昌、甘段和甘孜飞机场外，以军直一部和第五十二师的 2 个团，经丁青、边坝、沙丁、太昭等地，进驻拉萨。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由门工进驻察隅。